

## 方汉奇：新闻学研究会

文 / 方汉奇



### 方汉奇

方汉奇，祖籍广东普宁，1926年12月27日生于北京。他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公认的中国新闻史学权威和学科带头人。

他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及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顾问、课程教授及兼职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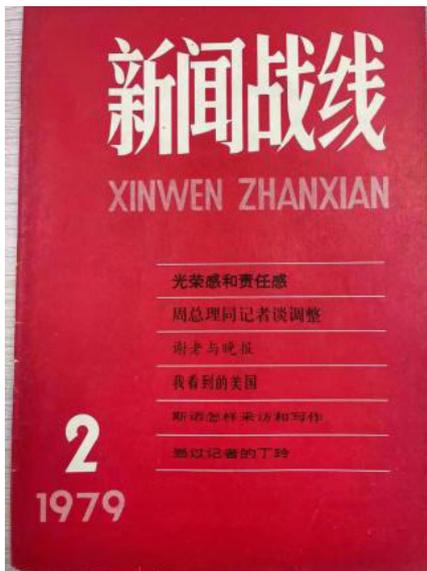
他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60余年，载誉无数。他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一次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9年被评为“共和国60年传媒影响力人物”，2017年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编者按：北京大学享有“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之摇篮”的声誉。1917年，徐宝璜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选修课，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由校长蔡元培亲任会长，这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科的诞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推出“新传史话”栏目，聚焦北大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发展历史，重读经典名家作品、分享学者育人治学感悟。本期“走近大家”推荐中国新闻史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在1979年为新闻学研究会所作的专题文章，以飨读者。

一九一八年在北京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毛泽东同志就是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各项活动的正式成员。

#### 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

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主持公务的是他的校长室秘书，刚刚从美国学新闻回来的徐宝璜教授。根据当时公布的简章，这个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研究的主要项目，是“新闻学之根本知识”；它“隶属于北京大学，凡校内外人均可入会为会员”；“校内会员每人年纳会费四元，校外八元”；凡在会内研究满一年以上者，均由该会发给证书。这些章程后来并没有完全执行。例如会费就没有严格收取，不少经济困难的会员并没有照章纳费。颁发证书也不以“研究满一年以上者”为限，不少参加了



本文原载于《新闻战线》1979年第2期，第38~40页

半年活动的会员，也领到了证书。准备发给毛泽东同志的证书，就属于“听讲半年”这一类。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了该会发给证书的名单，毛泽东同志名列“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中的第十名。

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规定为每周两次，一般安排在星期一、三的晚上，后来又在星期天的上午增加了一次。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听导师演讲，有的时候也组织一些讨论和练习。根据该会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议定的“讲演会大纲”，除了请导师演讲，还有一个敦请中外记者、本校教授和知名人士前来演讲诸如“群众心理学”“现在外交之趋势”“吾国近来经济教育之状况”“国际法大纲”等专题的计划。这个计划似乎没有来得及实现。新闻学研究会的事务所即设在文科大楼二层徐宝璜的办公室内。主要集会地点是文科大楼三层的第三十四教室（有时是第三十五教室）。这个文科大楼就是现在矗立在沙滩五四大街北侧的那座蜚声中外的红楼。

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被介绍到中国来，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事情。但是，



方汉奇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合影



在方汉奇的书柜上，摆放着他拜访萧乾（左）时的合影

到一九一八年为止，除了翻译出版过一本日本人松本君平写的名为《新闻学》的小册子，和在个别报刊上出现过几篇探讨报纸作用的文章外，还没有人对新闻学作过专门的研究。新闻学研究会是我国组织起来对新闻学这门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个团体。

除了导师们每周两至三次的定期演讲外，新闻学研究会在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还组织过以下几次活动：首

先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晚八点召开的那次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蔡元培以校长身份做了演讲，叙述了他和新闻界的因缘，回忆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参加《苏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活动的战斗经历，勉励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们能够很好地总结“我国新闻界之经验”，“归纳之而印证学理”。在这次会议上，主持会务的徐宝璜还做了《新闻纸之职务及尽职之方法》的报告。



著名漫画家丁聪为方汉奇画的肖像

其次是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午后召开的改组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蔡元培当选为会长，徐宝璜当选为副会长，曹杰等人当选为干事。再次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全体会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了预拟的“讲演会大纲”，做出了筹办通讯社和出版一种“传播新闻学识之报”——《新闻周刊》——的决定。这些活动，毛泽东同志都参加了。

这以后，新闻学研究会还有过几次重要活动。如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创刊《新闻周刊》，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等。这些活动，毛泽东同志由于已经离开北京，就都没有参加。一九二〇年以后，第一批会员多已毕业离校，政治、哲学等系又都已开设了新闻理论课，有兴趣的会员可以选修，加以徐宝璜又忙于筹办民国大学的事，无暇多顾，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就逐渐地停顿了。

### 徐宝璜和邵飘萍

新闻学研究会一共聘任过两位导师，一个是徐宝璜，一个是邵飘萍。徐宝璜（一八九四——一九三〇年）江西

九江人。一九一二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官费留美，在米西庚大学学经济和新闻等科。一九一六年回国。先是在北京《晨报》当编辑，继而回到北大，担任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同时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各项活动。一九二〇年后，他先后在民国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任教，担任过民国大学的代理校长，平民大学的新闻系主任，并积极筹备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系。一九二七年一月，北京的一些新闻记者组织“新闻学会”，出版《新闻学刊》，也得到过他的支持。徐宝璜在担任新闻学研究会导师这一期间，每星期一、三晚上七至八时，都要给会员讲一次新闻学基本知识，内容从新闻学的定义，到报纸的性质、任务，兼及报纸工作的编辑、采访、评论、发行等各个方面，对通讯社的业务也作了探讨，有点类似于后来各大学新闻系开设的《新闻学概论》。他的这部讲稿，约六万字，经过整理，曾先后在《东方杂志》《北京大学日刊》和《新中国》等刊物上发表。后来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用《新闻学》的书名，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出版发行（一九三〇年被上海联合书局列为新闻学丛书之一，重新出版，改名《新闻学纲要》）。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他也因此被一些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推为“新闻教育第一位的大师”，和“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黄天鹏《新闻学纲要序》）。徐宝璜受蔡元培的影响，在政治上倾向于进步，三·一八惨案后，曾被段祺瑞政府列入第二批缉捕名单，见于鲁迅《而已集》内的那篇《大衍发微》一文。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他因病死于北京，年纪很轻，才三十七岁。

邵飘萍（一八八四——一九二六

年），名振青，浙江金华人。十四岁中秀才，十八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一面教书，一面为上海各报写通讯。一九一二年，他和杭辛斋合作在杭州办《汉民日报》，以指责袁世凯被封，这是他办报活动的开始。一九一四年他逃亡出国，在日本办过向国内发稿的东京通讯社。回国后，先是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等报担任主笔，继而又被《申报》派往北京担任驻京特派记者。一九一六年七月在北京创立新闻编译社，一九一八年十月又在北京自办《京报》，文思敏捷，机杼无穷，成为名满京华饮誉全国的新闻记者。邵飘萍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被聘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从这一天起，到一九一九年底止，除了寒暑假和“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一段时间外，他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的十点至十一点，都到新闻学研究会做演讲。和徐宝璜不一样，邵飘萍给会员们讲的主要是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他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体会和经验，现身说法，妙趣横生，很受欢迎。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讲稿，经过整理，于一九二三年九月辑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交由《京报》馆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述我国采访学的长著。邵飘萍是一个追求进步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爱国，有正义感，不畏强暴，迭次和封建军阀禁锢言论的出版法作斗争，屡被缉捕。五四以后，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热情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赞颂十月革命，在自己主办的报纸上出版《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和《列宁特刊》，终于被扣上“宣传赤化”的帽子，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他是他所在的那一时代，以身殉报的少数几个有名的新闻记者之一。

两个导师中，邵飘萍给毛泽东同志

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二十年后，毛泽东同志回忆起他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这段经历时，还特意提到邵飘萍的名字。他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好几个同伴，……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情理想和良好的性格。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枪决了。”（据斯诺《西行漫记》）

### 学会的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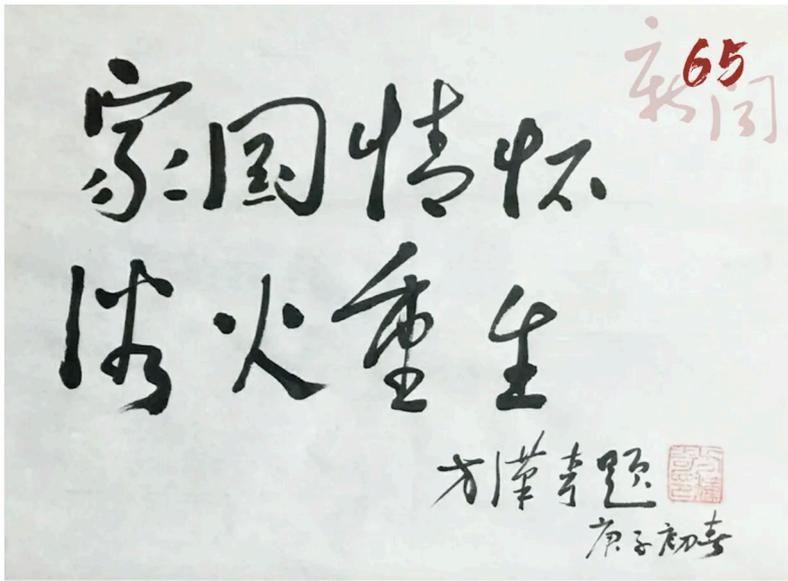
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六日蔡元培曾经代表新闻学研究会向参加听讲的会员颁发了证书，其中得听讲一年证书的二十三人，得听讲半年证书的三十二人，共五十五人，这大约就是这个会正式会员的人数。此外，也许还有一些听讲不足半年，中途离去没有得到证书的会员，但是这一部分的数字和名字未见著录，已经无从查考了。

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以文史哲法等系的学生为多，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多数没有参加过新闻工作。会员中年纪最大的是谭鸣谦（即谭平山），入学前就已经当过中学校长，一副老学究模样。年纪最轻的是杨兴栋，当时才十九岁，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身材瘦小，一口东北口音，脸上还时时流露出稚气。这位年纪最轻的会员就是现在北大中文系的杨晦教授，杨兴栋是他在北大念书时用的名字。杨晦教授今年已经八十岁，是新闻学研究会目前还健在的一位会员。对这位当时最年轻的会友，毛泽东同志在事隔二十多年后还记得很清楚。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时，和杨晦教授在一次欢迎集会上相遇，一眼就认出了他，高兴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认得你！我认得你！”

由于是一个群众性的团体，会员良



方汉奇与学生们在一起



方汉奇题词：家国情怀，浴火重生

莠不齐，各人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以后所走的道路也很不一样。有的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有的人则夤缘成为反动政府的新贵，乃至堕落成叛国投敌的无耻汉奸。

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很重视研究报纸，每天从不间断地阅读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报纸，读得十分认真仔细。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给《新青年》和《湖南通俗报》写稿，开始了他的报刊工作

实践。刚到北京的时候，杨昌济先生曾经有过介绍他到一家报馆工作的打算。计划虽然改变了，但他对报纸工作的兴趣并没有改变。在北京期间，他的住所仍然几乎“满屋都是报纸”。

离开新闻学研究会和离开北京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立刻开始了他的革命报刊工作的实践，在长沙创办了在我国无产阶级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革命报纸——《湘江评论》。（选自《新闻战线》1979年第2期，正文图片由程曼丽教授、陈刚教授提供）

## 一砖一瓦搭建新闻史学科大厦

文 / 邓绍根 游丹怡



2021年，方汉奇先生95岁寿辰 作者/供图

2021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中国新闻史”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95岁的方汉奇先生步入会议室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掌声是对方先生的由衷敬意，更是真切祝贺。在9月26日国家教材委员会公布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第3版）荣获一等奖，是新闻传播类教材唯一的一等奖著作。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正以此次获奖为契机。

《中国新闻传播史》初版于2002年，历经两次修订，为全国大多数新闻院校选用，影响了几代新闻学子，“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这本重量级教材，是方汉奇先生毕生的积累与心血。作为新闻史学家与新闻教育家，方汉奇筚路蓝缕、厚积薄发，为新中国新闻史学科发展筑牢根基、培育英才，以毕生之力一砖一瓦搭建起了新闻史学科大厦。

### 爱好集报，踏上新闻史研究之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将中华民族逼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平津危急！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就此改变。当时方汉奇正在北京念小学，也不得不随家人开始逃难。迫于战乱，他频繁转学，全面抗战八年念了八所中学，尚且年少就已饱受流离之苦。

1944年，方汉奇转学至广东梅县的梅州中学念高二，遇到了一位过去在北京相识的长辈。这位长辈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方汉奇的姑姑方群凤的同班同学，本是梅州籍，当时在粤北一所小学教书。她的丈夫是北伐老四军的军长，已牺牲在抗日前线。

于战乱中得遇故旧，有其格外珍贵之处，而对方汉奇来说，更有另一番非凡意义。方汉奇到她家做客时，在藏书中发现了几十份旧报。当时的梅州，能够见到的报纸只有一两种。方汉奇在高

一时曾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负责办墙报，需要时时关注战争的信息并采访写稿。此时能看到这些出版于京沪一带的旧报，方汉奇自是爱不释手。长辈见方汉奇对旧报十分喜爱，就将这些报纸都送给了他。

这是方汉奇所集的第一批报纸，这次做客也成为他集报爱好的开始。旧报上登载的人与事，虽已为陈迹，但邵飘萍、范长江等名记者的胸中丘壑、笔下风云，始终令方汉奇无比神往，他因此立志要考新闻系、做新闻记者。高中毕业时，方汉奇报考了几乎所有设立了新闻专业的大学，唯一没有报考私立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因为学费太贵。最后，方汉奇考上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念了四年的公费大学。

虽然是穷学生，方汉奇为爱好花钱却很大方。他想方设法收集各类旧报，常去旧书店“淘宝”。当时的旧书店，大多看重旧书，而不看重旧报，要收集旧报，就得到店里的废纸堆里翻找。1947年8月，方汉奇与学长穆家珩一起逛旧书店，找到了一堆20世纪20年代的《时事新报》和《申报》。那天他们用一个烧饼的钱换来了好几种旧报，收获颇丰，倍感高兴。大学期间，方汉奇逛了三年旧书店，藏报增加到1500多种，还有不少可称为“海内孤本”的珍品。

基于如此丰富的收藏，方汉奇于1948年撰写了13600多字的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在《前线日报》副刊上连载了8期。这是方汉奇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自此他走上了新闻史研究之路。

集报种类不断增加，方汉奇自有办法把它们整理得井井有条。他仿照杜威

十进分类法，将报纸分类编目，一共有10大类、118小类，对于有历史价值或特殊意义的报纸，还会附上详细的说明。1948年12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庆祝建校7周年，举办了一次全国报纸展览，三年级的方汉奇作为班上的学术委员，是报展的主要筹备者和展报提供者，报展采用的分类方法也来自于他。筹备三月、为期两天的报展，一共展出了1650种报纸，占用了10间教室、400张课桌，参观人数超过6000人，《申报》《报学杂志》等都对这次报展进行了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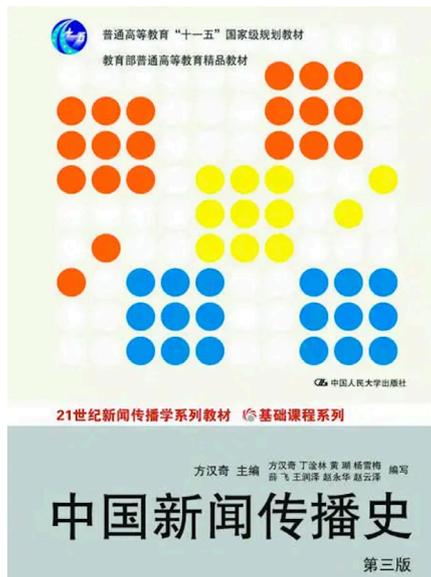
方汉奇对新闻史的兴趣与积累，给当时的系主任马荫良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1月临毕业时，方汉奇收到了时任上海新闻图书馆馆长马荫良的一封信，这封信给他带来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

### 调查藏报，摸清新闻史研究家底

《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是一本几近散架的旧书，1951年1月由上海新闻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编印，并附新闻学图书目录，扉页对收录范围有更细致的解释：“藏报种数在二种以下，藏报数量在一年以内者，不列入。”这本调查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上海全市至少收藏报纸2种及时间长达一年以上的31个各类型图书馆的藏报情况，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70年的岁月流转，让书页变得泛黄而发脆，翻阅起来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同捧着一份久远而珍贵的记忆。这样一本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编纂而成的工具书，正是方汉奇的作品，那时他25岁，刚刚大学毕业。

1950年3月，方汉奇正式到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这是一家报纸专业图书馆，由解放日报社、新闻日报社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共同创办，为安置上海解放后因《申报》《新闻报》停办而退下来的老记者、老编辑。时任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

《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钱逸群为理事长，聘任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为馆长，《申报》主笔冯都良为副馆长，原《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为主任。当时上海新闻图书馆共有23人，方汉奇是里面唯一的年轻人。

《申报》《新闻报》是上海的大报，上海新闻图书馆基于它们的资料室建立，藏有600多种报纸。方汉奇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旧报资料，吃住都在馆里。老报人们大都有20多年新闻工作经验，有不少旧闻趣事可聊。方汉奇白天听老报人们讲故事，等到下午5点他们下班后，就读书看报，3年看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27000多份《申报》，连专门研究《申报》的学者都少有做到。

当时的上海，包括上海新闻图书馆在内，共有57家公私图书馆，星罗棋布，各具特色。方汉奇想到，把上海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调查清楚，正是一个以“新闻”为名的专业图书馆分内的事。于是，他向馆里提出建议，得到了马荫良和严独鹤的大力支持。

作为唯一的年轻人，到各图书馆实地调查的任务，方汉奇自是当仁不让。1950年5月开始，他每日往返于上海新闻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之间，把上海所有



《方汉奇自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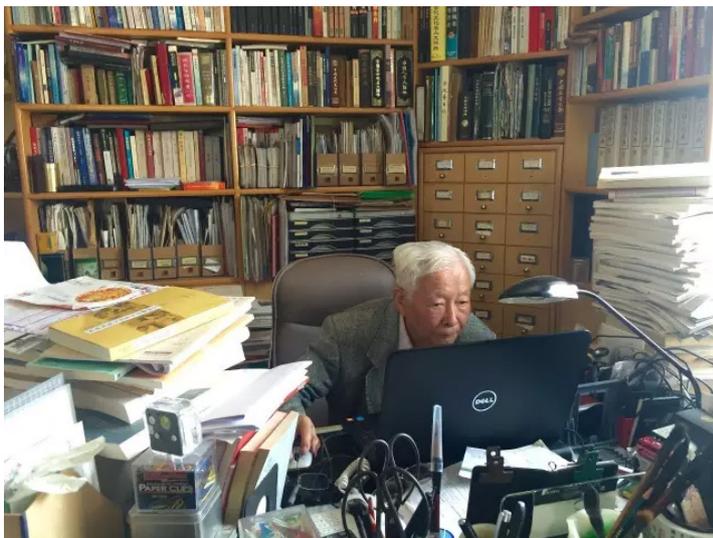
图书馆跑了个遍。徐家汇藏书楼给方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收藏的报纸特别多”。始建于1847年的徐家汇藏书楼，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图书馆，方汉奇去的时候，藏书楼里的法国神父尚未离开。

在馆里提供的500元经费支持下，方汉奇“单兵作战”8个月，不仅调查了各图书馆的藏报情况，还摸清了新闻学藏书情况，编出一本目录。严独鹤为之题写书名时，还颇感遗憾，因为刚刚毕业经验不足的方汉奇忘了写前言后语，没有为读者交代成书背景。方汉奇编辑的调查录，不仅是一份历史记录，还是一个年轻人执着努力的心血见证。

202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为新学期举行开学典礼，满头银发的方汉奇为8000多名新生带来一堂“公开课”。他叮嘱大家，“最好的年华要去做最应该做的事”，希望大家“多读书、多坐冷板凳、多泡图书馆”。70年前，方汉奇就在他“最好的年华”里做了“最应该做的事”。

### “找米下锅”，绘制新闻史知识图谱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20世纪后半



方汉奇在书房里工作 记者章成霞 摄



方汉奇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方汉奇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在新闻战线上

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在院系调整中，中国新闻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南方的新闻教育资源都汇聚到复旦大学；在北方，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交由北京大学接办，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下的一个专业，由此形成了中国新闻教育“一南一北”的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

1953年8月23日，方汉奇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四大件行李来到北京大学，成为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名助教。虽然只是助教，也有正式的聘书，由马寅初校长亲笔签发。从此，方汉奇结束了3年的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生涯，正式成为一名教师，专门从事新闻学的教学工作。

实际上，方汉奇的从教生涯开始得更早。195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主任黄嘉德要找一位兼职讲授新闻史的教师，马荫良便推荐了方汉奇。那时方汉奇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讲课效果却很不错，“一上讲台，四座静听”，黄嘉德当即约请方汉奇常去兼课。于是，方汉奇开始每周去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讲两个小时的新闻史专题。当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的范敬宜还旁听过方汉奇的课，印象深刻，多年不忘。

方汉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授课，以及他在新闻史研究方面的兴趣与积累，都被他的邻居、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和秘书室主任罗列看在眼里。有丰富新闻教育经验的罗列与方汉奇十分投契。1953年3月，罗列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负责新设立的新闻专业。赴任之前，他邀请方汉奇到北京大学任教。因为“对教师这个职业感兴趣”，方汉奇欣然同意。罗列后来对这次“挖角”还颇有些自得，“说方汉奇是我请来的，要不是我请来，他也不会搞新闻史”。

慧眼识英的确了不起，当时在大学里教新闻史并非易事。为了建立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包括课程内容在内的各方面都要进行巨大的调整和变革，但是缺少资料令当时负责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任务的方汉奇颇感棘手。已有的新闻史研究作品，仅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等少数几本有参考价值。但戈氏著作下限仅到1927年，其中还有不少错误。更困难的是革命报刊史部分，除了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提及的寥寥数语，再无其他现成资料。

当时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程的，除了复旦大学的曹亨闻老先生，就只有方汉奇一人，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完全是一块待开垦的园地。方汉奇到北京大学

时，离开学上课仅剩一星期，他只得一边讲课一边收集资料备课。一开始，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收到了很多意见，方汉奇很为此感到苦恼。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方汉奇开始“找米下锅”。除了上课和教研室的例会，其他时间他都用来看书备课。寒暑假时到京沪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和搜集报刊资料、走访老报人。得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原件，馆长向达亲自保管，不能外借，方汉奇就在向达的办公室里翻阅报纸完成备课。从1953年到1958年，方汉奇看完了2000多本书。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的上衣两肘总是最先磨破，为此准备了多副袖套备用。

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随迁人大，但潜心备课积累如旧。新闻史的史料，过去不被重视，尤其是古代史部分，零散少见，而且往往深藏于各种历史文献的边边角角、隐秘之处。方汉奇以青春为代价，埋首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精心寻觅星星点点的一手史料，为新闻史教学研究一点一滴筑牢根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终有回报。自1953年起，方汉奇以研促教，陆续发表20余篇论文。至1965年，

已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方汉奇编印了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讲义》，积年苦功，心血之作，初步绘制出新闻史的知识图谱。忆来时青春年少，此时也将步入中年。一手史料的充分占有，使得方汉奇的课以旁征博引、资料丰富著称。当年听过他讲课的成美教授回忆道：“方汉奇老师讲中国报刊史，常有许多生动有趣的材料，被称为‘海内孤本’。有一次，他引用古代文献，并介绍《京报》的出版情况，绘声绘色，听得大家屏息无声，忘记了下课。”

### 数万卡片，垒起一座新闻史高峰

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方汉奇第二次从北大来到人大，从此一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这时方汉奇已52岁，此前十年他做过不少事，下放江西“五七”干校时还在采石场打过石子、在食堂做过伙夫，但就是没能再进行新闻史教学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春回大地，中国新闻教育也重新起步恢复发展。已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的方汉奇找到系主任罗列，提出想要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建校30年献礼。

写书的材料基础，来自方汉奇长期积累的几万张卡片。方汉奇上大学时从曹聚仁先生的新闻采访课上学来了做卡片积累资料的方法，从此一直坚持下来。在上海的3年，方汉奇翻阅了上千种报纸，摘录了两万多张卡片。即使在动荡年代，家当都丢了，卡片也舍不得丢。有长期积累的卡片做基础，方汉奇重新投入到紧张的教学、研究和著述时，笔下马上结出了累累硕果。

从1978年夏天开始动笔，方汉奇足足写了两年，而为此他已积累近30年，甚至为写这本书就专门做了2.5万张卡片。当时条件艰苦，家中连一张写字的书桌都没有，方汉奇就趴在书箱上写完了书——这五个宝贝大书箱，在下

放江西时他也一直带在身边。由于教学工作忙碌，写书只能见缝插针利用课余时间。方汉奇一开始只打算写8万字，但写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成了一部57万字的专著，涉及报刊超过1160种，介绍报人1500余位，纠正前人著述错误200余处。“乍暖还寒”时候，这种写法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自1949年以来，新闻史研究几乎不谈人物，而《中国近代报刊史》光是重点展开的报人就不下百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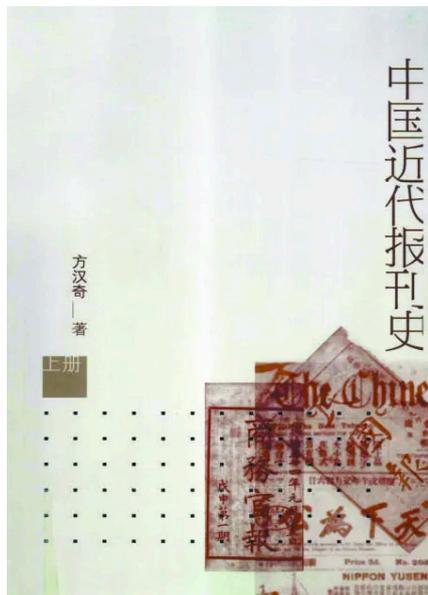
1981年元旦，方汉奇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刊史教研室为《中国近代报刊史》写下后记。中国人民大学30周年校庆已经过去，但这部凝聚了方汉奇30年心血的专著，意义远远超过一本献礼的小册子。该书一经出版就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公认为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座高峰”。书中大量丰富的一手史料，以及所确立的新闻史研究基本方法，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 潜心著述，夯实新闻史学科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新闻教育开始恢复发展，但“新闻无学”的看法仍然十分普遍。从业界到学界，“新闻有学无学”的激烈论争遍布全国各新闻院校、新闻单位，成为热门话题。对于新闻学者而言，摘掉“无学”的帽子，成为新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5年，方汉奇发表文章《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引起较大影响。他强调，“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同时，他基于丰富的材料指出，中国新闻学研究始于新闻史研究，新闻史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闻学学科建设起到基石作用。

“新闻学是学”，有如“白米饭是



《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

饭”，之所以要为此撰写专文，正是因为当时泛滥的“新闻无学”错误观点，不利于新时期新闻学的健康发展。

为了筑牢学科基础，自1986年起，方汉奇和宁树藩、陈业劭等老一辈新闻史专家组织全国20多家新闻学术单位的50位学者，编写出一套26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13年呕心沥血，终于在1999年出齐。这套通史“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都是同类著作中所未有的”，代表了当时“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2013年在新加坡出版了英文版十卷本，成为“新中国新闻学著作的第一个外文译本”。2000年，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三卷本出版，编纂历程跨越20年，记载的史料极为丰富、可靠，具有夯实中国新闻史学科基础的重要学术价值。

三千多种集报、十万余张卡片、专著、通史、编年史、教材……方汉奇一砖一瓦搭建起中国新闻史学科大厦，为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做出巨大贡献。1981年，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时，新闻学未被承认是一个学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列为文学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拜访方汉奇教授。

的二级学科。时任学科评议组成员的方汉奇积极倡导将新闻学科从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评定为一级学科，有了自己单独的学科评议组，学科范围内的一切评议活动，终于可以自己做主。

2016年，在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研讨会暨方汉奇从教65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杨保军教授的发言十分恳切，中国新闻学正是因为有了方先生这样的泰山北斗，这个学科才自信豪迈，才扬眉吐气，才在有学与无学的不断纠缠中成长并成为时代的显学。

### 桃李芬芳，守望新闻史未来发展

1978年，方汉奇开始招收硕士，1984年开始培养博士，迄今“方门”桃李已经满天下，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中流砥柱。方汉奇不仅是新闻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园丁”，更是“园丁们”的“园丁”，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尽心竭力。

1984年1月，新闻学专业被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方汉奇与王中、甘惜分三位教授成为我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那时的新闻学博士培养，生源并不多，同学们大多数更加向往业界。发现有天赋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时，方汉奇总是尽最大努力鼓励他们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前进。尹韵公是方汉奇培养的第一届新闻史博士，他回忆当时方汉奇先生三次去他的宿舍劝说他报考博士，“当时我住在5楼，方老师已是年过半百，可还是一趟趟亲自到我住的地方来动员我继续深造”。

从1985年招收第一届博士开始，迄今方汉奇已指导了50余名博士生，现在还在指导“关门弟子”完成博士论文。方汉奇培养学生，强调博览群书、有的放矢，且鼓励学生发挥特长，循着自己的研究志趣不断开拓，并强调在前人基础上要有所创新。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还记得，方先生指导学生的论文选题时，会细细梳理一遍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路边的桃子已经被前人摘了，需要你再去发现、另辟蹊径了”。

“方门弟子”的研究领域不仅在时段上从古至今，覆盖唐、明、清、民国、当代等多个时期，还有对《蜜蜂华报》《述报》《上海犹太纪事报》等重要报刊及舍我、胡政之等重要报人的深入考察。在方汉奇的指导下，“方门弟子”各有所长，毕业以后厚积薄发，在各自领域纵深开拓，不仅成为新闻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更从多个层面拓展了新闻史研究的领域、方法与进路。从中国到外国、从报刊到新媒体、从业务到体制……作为第二代新闻史研究者，“方门弟子”在方先生等第一代新闻史学者的基础上，为新闻史研究铺设出更为广阔与精细的学科地图。

方汉奇曾说：“当教师的要有‘蜡烛’精神。燃烧自己，点亮别人。对学生必须全心全意，尽心尽力。从做人到做学问，都全力地帮助他们，关注他

们，关爱他们。学生尊敬老师，老师关爱学生，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关系始终是很融洽的。”每年教师节，到方汉奇家中拜访的学生络绎不绝。而不管此前在何处，每年的9月，方汉奇也一定会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学院的开学典礼上，为新生送上他的勉励与期许。

方汉奇所关注的，远不止自己的学生，“所有的求助在方先生那里都会有下文，提携后人方先生的一种习惯”。很多后辈学者都收到过方先生的尽心指点与鼓励，大量新闻院系在建设发展中得到方先生无私、公正与细致的建议。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磊曾说，“为了国内新闻院系的建设，方先生不辞辛苦，可以说是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

年逾90的方汉奇自称新闻史研究的“退役老兵”，凝聚半生心血的十万余张卡片也早已捐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但他还是在一直守望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新闻教育的发展。2017年9月，方汉奇荣获有中国人文社科领域最高奖项之称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这辈子得过一些奖，没得过这么大数额的奖金”，方汉奇一生勤俭节约，最大的花销是买书。得知获奖，他马上将奖金悉数捐出，用以支持全国新闻史研究、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在“中国新闻史”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的发言中，方汉奇再次勉励大家一起努力，促进新闻史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进一步发展。“长江后浪逐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一位新闻史学家的殷切期盼与恒久守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19ZDA3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 我与新闻学家方汉奇的往事

文 / 胡荣彬

2024年11月8日是第25个记者节，我想起了为收集徐宝璜、黄远生的资料，与新闻学家方汉奇教授交流的往事。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是蜚声中外的新闻学教育家和学者。多年来，这位老教授一直跟我保持书信联系，并亲切地为我的作品题词。方汉奇教授寄给我的20多封信件里，凝聚了他大量的学术心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教授曾说，“所有的求助在先生那里都有下文。提携后人是他的习惯。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标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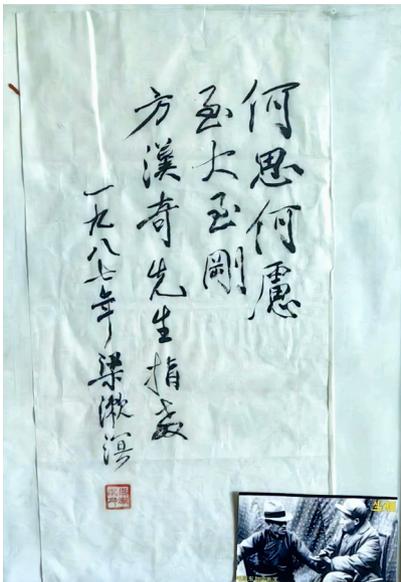
方汉奇先生与本文作者

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个集报爱好者。因收集的报纸渐多，我慢慢知晓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两位被载入《辞海》的九江籍人物，他们分别是“中国新闻学的开山祖”徐宝璜和“中国新闻通讯的创始人”黄远生。在中国新闻史上，他们是先驱，是不可遗忘的人物。

徐宝璜（1894—1930年），字伯轩，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晨报》的编辑，继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徐宝璜是中国新闻界的开山鼻祖，他的身上有太多“第一”：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的人、第一个参与创办新闻学研究团体的人、第一个出版新闻学专著的人、中国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

师。1916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徐宝璜先是在北京的著名报纸《晨报》担任编辑。次年，23岁的徐宝璜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教授英文，并担任校长秘书。1918年，徐宝璜与蔡元培一同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也是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起源。研究会创办新闻刊物《新闻周刊》，徐宝璜担任编辑主任，这份刊物采用西方更为通行的横排版式，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刊物。1919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新闻学〉本日午后出版》，宣布徐宝璜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新闻学教材及专著《新闻学》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涵盖了徐宝璜先生的主要新闻思想。

黄远生则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出生于江西九江的黄远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黄远生不肯出仕，最终选择东渡日本，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学成归来黄远生本不愿踏足官场，但此时清廷施行新政，推行法制，这使内心充满抱负的黄远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以进士兼留学生的双重身份进入邮传部，任员外郎。然而时局不济、民生凋敝、国事弥坚、官场愈发黑暗、人心愈发涣散，黄远生开始清醒，他终究不甘于“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于是选择投身新闻界，成为一名职业记者。黄远生的新闻通讯主要作于任《时报》驻京特约记者期间，黄远生共有论说、通讯、时评和杂著四类文章共237篇，其中通讯占有168篇。他为《时报》采写“北



梁漱溟字应为梁漱溟题字



时任北大新闻系教授方汉奇

京通信”约170余篇，平均每月发表11篇，数量相当可观。黄远生善于分析热点事件，文章见地深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民生疾苦到官场时局，时人读了他的通讯即可了解时局动态，而且不偏不倚，独立自主。黄远生是动荡时代的一个传奇，是中国首位走上新闻职业化道路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的新闻理念对今天的新闻事业发展依旧具有借鉴意义。

新闻史研究既是对过去新闻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新闻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入发掘。身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首任会长以及当代中国新闻史学泰斗和集报先驱，方汉奇主持编著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两部中国新闻史学巨著，全景式地勾勒出上至唐代，下至现代1200多年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图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国际地位。方汉奇教授也对徐宝璜、黄远生深有研究。

我与方汉奇教授结识纯属偶然。一次，我偶然从1994年3月24日的《人民

日报》上看到北京举行纪念徐宝璜诞辰百年座谈会，立即致信座谈会的主办单位，咨询相关的会议资料。后来，我的信件转到了方汉奇会长手中。他亲切地给我回信，详细答复会议情况，并为我寄赠了会议资料。信中，方汉奇提及徐宝璜墓，但不知详情。我曾收集多种介绍徐宝璜生平的资料，也收集过许多九江名人的史迹、墓葬等方面的资料，均未提及徐宝璜墓的消息。

徐宝璜英年早逝，他的事迹已渐渐被人淡忘。他七岁离开九江，但仍为家乡做出过不少贡献。据悉，身为著名的居京赣人，学界代表，每当本省权益受到损害时，徐宝璜都会和同乡们一起在京城为家乡站台，向政府请愿。

徐宝璜去世后，归葬故土。能找到徐宝璜墓，让全国各地新闻、文化等各界人士悼念、瞻仰，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写信咨询徐宝璜四子徐厚舜老先生，当时住在南京的徐厚舜先生告诉我，他只知道墓在九江，说不出具体位置。多年前，徐厚舜曾回到九江扫墓，可每次都是由他在九江的表兄蔡报海陪

同。我又找到蔡报海的住处，上门询问。年近八十的蔡报海此时卧病在床，只能为我提供徐宝璜墓的大致方位。

为了找到徐宝璜墓，我多次骑自行车到九江市庐山区（现濂溪区）虞家河乡寻找，终于在鲁板村一山林中找到了徐宝璜墓。我仔细研究碑文，陆续找到相关的长者回忆徐宝璜下葬的往事，最终确定该墓确系徐宝璜的墓。

1995年3月30日，我采写的消息《九江发现新闻前辈徐宝璜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上海、南昌、九江等地的10多家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报道。方汉奇教授及相关专家非常关注此事。此后，我多次致信方汉奇教授，与他讨论将徐墓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分析《徐宝璜像赞》原文，为《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和《九江古今名人传》题词等事项。方汉奇教授工作十分繁忙，可他每次都认真地给我答复。1995年4月19日寄给我的回信，是他在赴上海讲学的临行前夕赶出来的。1995年10月20日的回信，是他从香港讲学回京后写的。方汉奇教授的关心和热情的鼓励，使我非常感动。

1997年，当我获悉徐宝璜住在台湾的三子徐友陶先生想维修父亲的墓时，便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名义在徐墓前建立徐宝璜纪念碑，并请方汉奇教授撰写碑文。此事虽一波三折，但因有方汉奇教授的鼓舞，最终于1999年初完成。为此，我写的《徐宝璜纪念碑在九江建成》的新闻刊登在1999年4月1日的《中华新闻报》，新闻被北京、上海、台北、南昌、九江等地10多家报刊转载。方汉奇教授为徐宝璜树碑立传一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却在信中给了我很多鼓励：“荣彬同志，寄来的徐宝璜纪念碑及碑文两幅照片均已收到。至此，为徐宝

璜树碑立传之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欣可慰。自95年发现徐墓，至98年为徐先生树碑纪念，你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可钦可敬、可佩……”

经过进一步探索，我又发现了徐宝璜的墓志铭及徐父、徐母和他妻子的墓，并找到了徐宝璜故居等遗迹。经过我和有关同志的多方努力，九江市政府批准公布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徐宝璜墓名列其中。此时，《九江市志》和《庐山区志》正在编纂，我向编辑提供了徐宝璜的资料。2004年出版的《九江市志》第四册和同年出版的《庐山区志》均记载了徐宝璜的传记以及墓和纪念碑的相关资料，徐宝璜也永远地留在了九江人民的心中。

## 二

2006年是方汉奇教授八十大寿。2006年2月26日《光明日报》上整版刊载了专访《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一文。同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等报纸均报道了《方汉奇从教55周年教学思想研讨会举行》的文章。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教育、史学等200余名相关专家高度评价了方汉奇教授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成就，并做深入细致的研讨。

2008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研讨会召开的新闻。会上，方汉奇教授高度评价徐宝璜为中国新闻史所做的开拓性贡献。会后，方汉奇教授委托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邓绍根来九江拜谒徐宝璜墓。

同年11月4日，邓绍根来九江，此时正是记者节前夕。当时，徐宝璜墓前水泥路刚竣工。这条路是由徐宝璜孙子徐伯言先生出资新建的。我灵机一动，立即与九江日报社的宋小勇、徐金前等人组织策划，在九江日报社举办了纪念



方汉奇先生接受本刊采访

徐宝璜史料展览座谈会。展览会上，展出了徐宝璜的著作、报纸资料及方汉奇教授的信件等一百余件史料。参会人士与邓绍根教授一起拜谒了徐宝璜墓。

《九江日报》刊发了此次活动的系列报道后，我把相关资料寄给了方汉奇教授。方汉奇教授高兴地给我回了信。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邓绍根编的《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将此次展览中的徐墓等资料照片编在书中。2016年版《九江市志》的第四册“报纸章”中，也记载了此次徐宝璜史料展览会的事情。2019年6月10日，《九江日报》“创刊70周年特刊”中，也将此次展览会的相关资料录入其中。

2011年10月18日，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拜访神交已久的方汉奇教授，与他交谈了很多九江籍新闻界、教育界的名人往事，并向他汇报了我对徐宝璜、黄远生的纪念研究情况。我将新出版的

《纪念许德珩文集》赠送给方汉奇教授时，与他共同回忆了许德珩先生。其间，方汉奇教授为我题字，并赠送我一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套书有厚厚的三大本，书中有方汉奇教授认真写下的笔记和眉批。

临别时，我拍下了方汉奇教授家里的照片。他的客厅、书房和过道处，摆满了各种新闻类书籍。201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许文心拍摄的方汉奇书房的照片。据说方汉奇教授的书房收藏了我国两百年的新闻史。他也是收藏中国新闻史书、报刊最多的人。

2024年8月，为庆祝中国集报活动40周年，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第四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在杭州召开。我怀着激动、期盼的心情参加了会议。会上展示了方汉奇题写书名的文集《集报，我们一直在路上》，里面有一篇彭援军撰写的文章《陪方老逛潘家园》。文章中



方汉奇先生全家福

介绍了2024年6月10日，98岁高龄的方汉奇教授，兴致勃勃地逛北京潘家园收藏市场，观看清代老报纸一事。这次盛会上，多位学者提出关于方汉奇研究的多项议题，如筹建方汉奇研究组织，筹编《方汉奇集报文集》《方汉奇书信集》《庆祝方汉奇百岁大寿文集》及组织相应活动，让全国报友深受鼓舞。

### 三

多年来，我收藏了很多方汉奇教授及徐宝璜、黄远生的资料。如2001年9月5日《政协报》上，由韩辉撰写的《方汉奇：书写新闻史的精彩篇章》一文；2016年1月7日《人民日报》副刊版头条，由陈昌凤撰写的《新闻史家方汉奇，笔走千秋》一文；2018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上，张慧瑜撰写的《中国新闻学的摇篮》一文。该文主要阐述了徐宝璜首创新闻学的巨大历史贡献；1991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和11月23日《人民日报》载发了我在九江发现记者黄远生墓的文章；1992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撰写的《黄远生家谱中发现朱熹佚文》一文。

2005年1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我组织举办杰出记者黄远生史料展览的图文报道。这篇报道还引起研究黄远生的专家——甘肃兰州鲁正蕙女士的重视，她将展览照片编入《报界奇才黄远生》一书的前页。近年，我应邀参与柴桑区黄远生研究会的创建、《黄远生研究》杂志的创办、黄远生故居的修复、黄远生石雕像的树立等事宜。每次，方汉奇教授都热情地以书信等方式支持、鼓励、指导我。

多年来，我热衷收集跟新闻有关的文物、建筑、墓葬，参观各地的报纸收藏馆。这些内容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不多，只有一些报馆的所在地被大略地提及。于是，我撰写了《从九江发现徐宝璜墓到建议开展全国新闻史迹普查》，从13个方面谈及普查的意义，提供相关方法，介绍九江的个案，其中，也包括方汉奇教授给我的一些书信。2016年11月，此文入选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并编入该会文集出版。主办方邀请我到南京师大参会发言，能参加此会，是对我多年集报和考察田野新

闻史迹的巨大鼓励，也是激励我不忘初心，努力前行的动力。

2016年12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刊载书香中国系列公益广告，方汉奇教授的照片占据了半个版面。2016年4月23日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光明日报》次日发表了整版读书日专题内容。上半版是各地读书日活动的文字报道，下半版是书香中国系列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的图片中，方汉奇教授站在书架前，旁边是他的题词：“书到用时方恨少！”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在新闻史教学研究领域奋斗了70余载。方汉奇执着守望新闻事业，辛勤培育新闻人才的精神对我们是一种巨大的号召与鼓励。

参加学术论坛后，我回到九江兴奋得难以入睡。我不停地思考，还能为新闻工作做些什么。我与集报藏书界的师友们交流讨论后，大家赞同我筹建九江藏书协会的想法。

经过两年的筹建，2018年4月22日，恰逢世界读书日前夕，九江市职工藏书协会在九江文化宫成立。

文献典籍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国现存古代典籍体量巨大，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藏书。民间藏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到当代仍旧有许多藏书家延续了这一文化传统，古籍收藏与鉴定工作在民间也开展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协会的成立团结了广大民间藏书爱好者，挖掘、整理、研究了九江丰富的人文资源，注重保护性传承，对以九江地方文献为主的大量民间藏书，进行打捞、摸底、汇总书目，凝聚成九江文化的新元素，助力作为民族记忆、精神家园的古籍文献在浔城脉脉相传。

## 方汉奇——百年中国新闻史守望者

文 / 徐雪莹 安英昭

编者按：今天是第25个中国记者节。日前，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和光华锐评联合专访了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2024年11月，随着他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97岁的他正式结束新闻教育生涯。方先生博学多闻，风趣幽默，3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堆满书籍的书房里不时传出欢笑声。从中华民族的士人责任到共产党早期的新闻事业，从报人到自己，且听他如何“老王卖瓜”



方汉奇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蒋启明 摄

按响门铃几秒后，一位身穿平整白衬衫、灰色西裤的老人出现在门口。除有时需附耳高声对话外，几乎难以让人同其短信中“我已耄耋”相联系。他仍保有每日读报的习惯，关注着中国新闻史学界最新动态。谈起新闻史往事，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走入方汉奇家中，书籍的馨香游离在每个房间。约30平方米的书房三面环书，墙上、书架上陈列着往日日和梁漱溟、金庸等大家的合影。落地至天花板的特制书架分里外两层，说是藏书万册也毫不夸张。一架望远镜，一把折叠梯，供房屋主人调遣书架上的千军万马。

“你们如果早几个月来，我还可以拿些新闻传播的书，跟你们说道说道。”方汉奇对中新社记者说。

去年10月，方汉奇将所藏3045本新闻传播学科相关图书，尽数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些书，由方汉奇一本一本挑选整理出来，收藏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2021年，亦是新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写照。

### 中国新闻史的“第一幅地图”

“50年代做教学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教材建设。”1953年，方汉奇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讲新闻史的课是必修课，却“没米下锅”。

中国新闻教育，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的报学系，初期对美国、日本经验多有学习。“西方当然它有它的渠道，它有它的模式，它有它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旧中国的办学参考西方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体制不一样，只能作为参考借鉴，不一定全部移植。”方汉奇说，“重要历史信息资料，特别是共产党新闻事业，是教学的主要方面，必须加强投入，加强收集。”

当时，全国大学中教中国新闻史的，只有曹亨闻和方汉奇两人。全国新闻史教学，基本依赖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为文本，但内容远不够丰富。

为讲好课，方汉奇5年读了2000多本书。大体上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

年》为主线，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看报刊原件。“年年都忙着，特别是节假日。寒暑假到上海、扬州跑书店，要不就到校图书馆去借。”方汉奇说。

“一个礼拜要上两个钟头的课，你得有材料，你得有说道。结果，我只好从秦皇汉武说起，说了两个多礼拜了才说到汉朝，然后再过两礼拜才到宋朝——戏台上管这叫‘马后’——底下那头角儿还没来，台上演员就开始慢动作，把戏拖着唱。当时上课就这样。”

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丁树奇、李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编写了一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早期“等米下锅”的状况才得以改善。

1984年，方汉奇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之一。1989年，和宁树藩、陈业劭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如今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1997年，在方汉奇、丁滢



方汉奇年轻时的照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供图

林、赵玉明等人的努力下，新闻学从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定名新闻传播学。

探秘、考证，追溯历史定格的切片，方汉奇如同历史的记者，和众多学人一步步拼织起中国新闻事业史全景。其撰写或主编书目，从断代史铺展至通史、编年史。其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所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影响了几代学人。

“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德无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图，标记了重要的矿产、河流所在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评价。

### “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26年12月27日，方汉奇生于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祖上是广东普宁人。外曾祖父林启，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者。外祖父林松坚，曾和鲁迅做过教育部同事。或许和敬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有关，祖父方云石为孙儿取名“汉迁”，后因谐音“汉奸”常引同学戏谑，

外祖父遂为其更名“汉奇”。

高中时，方汉奇喜欢上了集报，向往成为“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的记者。高考填志愿，“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46年，全国开设新闻系的学校就五六个。最终，方汉奇考取今苏州大学前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四年大学，没回过一次家，父亲提供不起苏州往返汕头的路费。

“这个时间段，我学的是新闻，我喜欢的是新闻史，我注意关注的是报纸，旧报旧纸。”就读期间，他的史学才趣初步显现，根据个人收藏的千余份小报，撰写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

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他未能如愿当上记者，而成为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1953年，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罗列“挖”去教新闻史。五年后，随北大新闻专业建制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他的新闻史公开课甫一开场，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讲梁启超，随口即可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讲到某历史人物或事件，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人物、掌故，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他对学生在学习研究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我们要看什么书、写什么读书报告、写多长时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告诉记者，“但同时，他也特别关心学生，让师母熬粥，他给生病的学生送去；还替学生介绍对象……”1997年，程曼丽应邀访问台湾，一封来自方汉奇的亲笔贺信辗转香港，成为她在台湾度过的生日里最温暖的惊喜——原是导师提前备下，委托同行的涂光晋教授一路携行，在生日当天念给她听。

如今，方汉奇成为新中国资历最

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其学生多已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新闻学院的中坚力量。

### 冷板凳上“打深井”

2023年6月17日，《〈大公报〉全史(1902-1949)》首发。该研究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个案史的重要成就”“‘打深井’的样本和标杆”。

这三卷书，在方汉奇的书房里也有一套。

通史研究，前人之述备矣。“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的方法，方汉奇一以贯之、颇为提倡。这意味着要达到前人未至的深度，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工作。

早在1985年，方汉奇就在文章《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中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一度存在“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问题。

“史论结合，没史怎么论呢？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得有个‘事’才能求到那个‘是’吧？所以，客观存在的媒体是第一性的，对它进行研究是第二性的。这方面，是一个本和末的关系。”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3年间，方汉奇读完了馆里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报》。写文章，他一般都从原件入手。

历史人物，聚讼纷纭，褒贬评说，颇多歧义。获得大量原始资料，才不会误判研究对象。过去，史学家们一度认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但当《胡政之文集》2007年出版后，新材料推翻了旧说法。方汉奇遂在《谁采访了巴黎和会？》一文中更正指出：有关巴黎和会进展情况的信息，是通过几个传者的群体，协作完成的。

“西方国家说《每日纪事》报罗马时代就有，拿证据来——没有证据。中

国唐代有进奏院状，宋代有“小报”，明代有报纸原件，不断有新的发现……原件最有说服力，比据说什么、听说什么要强得多了。”方汉奇说。

为全面了解邵飘萍，方汉奇曾前往北京、上海、无锡等地专程拜访其妻子、儿女，四次走访罗章龙，专门请教萨空了。还曾用20倍的放大镜观察邵飘萍在日本的照片，记录下架上书刊171册，可见书名16种。

考证中国早期报纸始见于唐代，为《大公报》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确认邵飘萍中共党员身份……如此这般，遍读文献，寻访人证，去芜存精，抽丝剥茧，成为方汉奇年复一年的治史日常。

做卡片，是他做学问的一个基本程序。所有看的材料、写的文章、引文根据，都要做成卡片。以图书馆卡片为样式，标题点名性质，正文下接出处，一般按照人物、事件、某一方面的类型集中来写。卡片的原则，写一面，不写两面，摆在桌面上可以综合分析。他把这项方法也教给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其学生程曼丽制作的学术卡片塞满了三四个大抽屉。

“实际上，我写的书里那些统计数字、那些引文都是平常做卡片积累的。哪记得住？记不住。但是一做了卡片，它一辈子为你服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写满10万张学术卡片，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录了各种学术资料。

“你回头去试试看，肯定有好处。”采访期间，方汉奇四次提醒记者回头也试试做卡片，“教我做卡片的也是老报人。曹聚仁，他是用来做新闻工作，做记者用的。”

### “感兴趣是新闻人的基因”

虽然2004年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

方汉奇始终没歇着，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用微信。家中电脑上，“卡片”身影犹存：在1TB容量的硬盘里，有条不紊地陈列着各类新闻史资料，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地区等分门别类。

电脑斜上方那面墙上，挂着国学大师梁漱溟赠予他的题词：“何思何虑，至大至刚。”

如今，97岁的方汉奇独居在北京。儿女在国外，和父亲保持微信联系。妻子晓芙去世后，方汉奇不愿找一个住家的保姆，怕保姆无聊时会看电视，影响他工作。家中请了定时送饭的钟点工。

2017年，方汉奇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决定全部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转账时，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差点报警，成为“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除了最大的花销买书，方汉奇节俭了一辈子。书房的皮沙发上，仍贴着一张“羚锐制药”牌“补丁”。不同于给来客准备的精致茶具，其个人“专用”茶杯，是极为常见的老式成套兰花玻璃杯中一只，杯壁早已不再透亮。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回忆，师母在的时候，连开灯都有讲究，规定几点之后才能开。

书斋之外，方汉奇是“行万里路”的践行者。其渊博的学识，大部分得之于书山文海，一部分则取诸山南海北。

茶几上，紧密排布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品：意大利比萨斜塔、西班牙圣家堂……都是他本人去过的地方。除了西藏，他去过中国其他所有省份。

“我喜欢旅行，就剩西藏没去过，希望有机会去一趟西藏。现在铁路修到林芝了，离这边内地已经不远了。”在方汉奇看来，旅行能提升对人文社会、对历史的了解，是很好的积累。行前他



方汉奇在家中的书房。蒋启明 摄

会提前看档案材料，到了现场遂能游刃有余。

音乐和体育，也在其兴趣之列。他喜欢京剧，演过话剧，指挥过合唱，闲暇时弹弹钢琴，曾是人大新闻系乒乓球代表队的“绝对主力”……

谈起对新闻学子的期望，方汉奇脱口而出：

“学新闻，就应该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凡是新鲜的事儿你都感兴趣。当然，搞新闻史还得对历史感兴趣，要多做这方面的积累。特别是做教学科研，需要积累做卡片。反正我是属于那种类型的，对所有的新事物都感兴趣，所有好玩的事都感兴趣。”

“所有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这个就是学新闻的人的一个基因。我考试我就报新闻系，别的系都不报。当然也有渊源。我从收集报纸开始，因此对新闻系感兴趣，对新闻史感兴趣，然后如此这般活到现在。”

（选自中国新闻网）

## 不怕慢，不要停

### ——访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

文字整理 / 胡晨愉 胡梦元



谈及钟爱的新闻事业，方汉奇神采飞扬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70多年，桃李芬芳，必感悟颇丰，可否分享一下心得？

方汉奇：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教师需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教师对学生必须全心全意、尽心尽力。教师这个职业是教学相长的，尤其需要不停学习研究，不断更新和补充知识，才能够有所开拓、有所前进，教学质量才能够不断提高。现在学科在不断发展，积累和补充也必须经常地、不间断地进行。我们要积极学习兄弟院校的先进经验，教学工作要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知识要更新拓宽，教学手段要不断改进，教学艺术要不断提高，教材要持续充实。总之，我们的工作还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这些，都是我们教师时刻不能放松的。

随着国家的发展，新闻教育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新闻教育要时刻关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要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相结合，要面向中国实践、

面向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知识体系。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人文社会科学固然存在很多规则和限制，但能够守着条框做出好文章，就是真正的高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学问不是一个人都能做完的，得让年轻人接着做。我作为这个学科一个时间段的工作者，我就站好我自己这班岗。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我很欣慰，好多学生都已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坚力量。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根本大计，是教师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光荣事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我们历经曲折无怨无悔，我们能在其中尽绵薄之力，感到无比欣慰。老师就要发扬红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为新闻教育的发展继续努力，不断作出无愧于时代和前人的贡献。

记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您长期致力于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看待新闻和历史的关系？

方汉奇：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事实第一性，强调事实的真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闻史的研究涉及历史真实的问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新闻史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是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新闻史很重要，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往往是从一些个案研究开始的，新闻史也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闻学学科建设起到基石作用。新闻的产生是客观的、不以人力为转移的，但是它的传播是一种社会性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环境、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由中国新闻史学会牵头、王润泽会长主持编写的《北京新闻史》即将完成和出版。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它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各个时期的历史密切相关，所以完成这本著作需要投入的时间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可喜的是即将面世了。

新闻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很贴近。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古为鉴、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使我

们聪明一点、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历史研究总是会考虑到现实的，是可以为现实服务的，应该确立一个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记者：新闻史研究强调事实第一性，强调必须全面客观辩证分析，您可否给我们举例展开谈一下？

方汉奇：新闻史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中寻找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客观存在着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事实是第一性的，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虚构的。新闻事实传播需要有载体，但真相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流失，也可能被篡改。不尊重事实的一切都经不起历史检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洋政府时期五味杂陈、瑕瑜互见，各种国内外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思想主张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寻求发展。除了负面的事物和观念之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并非负面的东西。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各种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兴政治力量的诞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军事“北伐”和大革命的发动，兼容并包的大学办学理念 and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学风的建立，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媒体上的文人论政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这一时期，都是这个多元化时代的产物。总之，这一时期虽然是军阀混战的时代，但是，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仍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其间的某些成就是可以载入史册垂之久远的。

具体到新闻史，经常想到的也往往是这一时期发生过的多少家报纸被封、多少名记者被捕杀害的“癸丑报灾”等。但是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得比较快的一时期。民办报纸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旧中国资格最老的申新两报和《大公》《新



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级研究生毕业留念。前排左三为方汉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供图

民》等报，都在这一段时间进入了他们办报历史上的黄金时期。20世纪上半叶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如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天津的《庸报》等，都创始于这个时期。中国最早的报业集团出现于这个时期。最早的新闻学团体、最早的新闻教育，也都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些都说明，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新的进展，也涌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吴廷俊最近编著出版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实事求是地做出辩证的分析，肯定值得肯定的东西、指出他们的局限和不足。这样，对我们今天来说，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历史借鉴。

记者：您从20多岁开始，坚持制作了十万多张学术卡片，这是您积累材料的手段，也印证着史料的积累是治史第一步，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汉奇：史学研究最宝贵的也是最难获取的就是第一手资料。治史必须把收集整理史料放在首位，现在做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第一手材

料。特别是有的时间距离太长了，收集材料有困难，很多第一手材料就被湮灭了，没有及时保存下来。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史料的充分掌握和精细研究、没有对关键史料的考证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禁忌。可以说，学术卡片为我绘制了一张纵横交错、宽广绵密的学术地图。做卡片是教学科研使用的一种手段，便于积累、便于分析。这是我念新闻系的时候，著名老记者曹聚仁先生在上课的时候教我们的，我一直坚持下来。我退休后就都捐赠给人大新闻学院研究新闻史的老师 and 同学了，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作为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要做到言必有证就必须大量收集占有资料。治学就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言必有证、无证不信，前辈学者都是这样做的，并非我的创造，我不过师法前人而已。要不沿袭旧说、不盲从，根据第一手材料判断问题。经过考证，正确的就继承，不正确的就予以订正。研究的时候要充分占有材料，要稳扎稳



方汉奇在与学生博士答辩后的现场留影



方汉奇与博士研究生研究论文写作

打，要步步为营，要厚积薄发。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把所有材料充分占有了，观点就比较站得住。

记者：每每说到治学态度，您总是强调要十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

方汉奇：是的，尊重前人的成果是治学者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一项原则，我在这方面一直努力身体力行。学术研究不论从规范上还是在实质上都不能是无背景的自说自话，而是与已有的研究成果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对话关系的。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一方面表现为要清楚地了解前人学术进展的程度，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开拓、有所前进，以免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则是指要重视学术规范，凡有征引一定要查找原文核对，加以注释，而且力求详尽，有关数据一定交代清楚。我经常讲，“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对同辈人要多借鉴，对年轻人要多扶持，应该有这样的襟怀。在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对某些新闻史的学术问题、某些新闻史的时间、某些新闻史上的报纸和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些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只要言之有故、持之成理，成一家之言，就都应该受到尊重。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特长，循着自己的研究志趣不断开拓，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

记者：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对于学术创新您如何看？

方汉奇：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新意，而新意来自深入的研究。为了使研究有新意，在研究的具体过程中，要力争做到“六新”，即要考虑怎么样做出新的概括，怎么样做出新的分析，怎么样运用新的语言，怎么样补充新的材料，怎么样提出新的见解，怎么样得出新的结论。

我是非常钦佩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老先生的。先生当年曾说过：“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老先生是很有骨气的、很有学术良知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好的榜样。

在研究中，要想有真正创新的见解，就不要迷信权威，应当不唯上、不唯书。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就要去坚持。这既是自信的表现，更是对学术的尊重。搞学术研究不能死守一家之言。许多课题和观点不是一代人能肯定或否定的，所以要允许各家去探讨。学术上互相补充和争鸣，新闻史研究工作才能繁荣。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您对媒体融合有何见解？

方汉奇：现在公众对信息的需求

与时俱进、日益增加，新闻传播的手段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过去口耳相传才能得到信息，现在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公众只需通过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天下事，全媒体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它和公众的关系、信息传播的密切度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我个人微博、微信、邮箱等也都使用过。微信很好，能传语音、能传照片，很是方便。手机里的微信好友和微信群也越来越多，有时和学生沟通论文，也时常在微信中进行。

现在是信息时代，全球化无处不在，想自我封闭都不行。在大形势推动下，新闻学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现在我们必须适应全球化的形势，必须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必须促进包括网络、多媒体这些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大，使整个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得到全面的发展。

记者：随着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等的建设，现在查阅资料更方便，是不是意味着新闻史研究更容易了呢？

方汉奇：新闻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新闻事业从无到有和不同时期发展过程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媒体、媒介出现之后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最新手段包括各种数字化设施的建设肯定会为史料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供图



左图: 2023年9月18日凌晨, 方汉奇审阅“关门弟子”博士论文 方彦 摄  
右图: 2022年2月19日方汉奇身手矫健地爬梯找书 周航屹 摄

收集提供便利,但是新闻史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后,要想真正推进研究,还需要精准的史学解读。研究新闻史要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求真、去芜存菁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挖掘史料是一方面,还需要善于联系历史语境。只有对史料进行综合、印证和分析,联系大小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背景,运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才有说服力。同时,问题意识是对史料进行深度解读的有效路径,可以让史料焕发出生命力。从史料的分析中认识历史、从历史的发展中探索规律,才能得出相应的历史结论。

记者:您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史研究者有何建议和期待?

方汉奇:新闻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今天的从业者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记者从事的是崇高的社会职业,每个新闻人都应当认识到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使命,要有自己需要坚持的东西。技术的手段可以多

元,但是新闻从业者的政治方向一定要正确,不管面对何种舆论,我们都必须坚决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大力弘扬主旋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职业操守、高度的敬业精神也是必不可少。同时,新闻工作者总是在和陌生的事物打交道,因此要不断学习,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努力增强文史基本功,提升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新鲜感和好奇心。未知世界无限广阔,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未来是什么,没有标准答案。而从未知到已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新闻史研究的确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新闻史研究者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题目要小、挖掘要深。通过做个案打深井,使研究向纵深发展,不至于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治史的正确路径是着手个案、超越个案、触类旁通、把握整体。任何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个案都与整体相联系。只有个案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中国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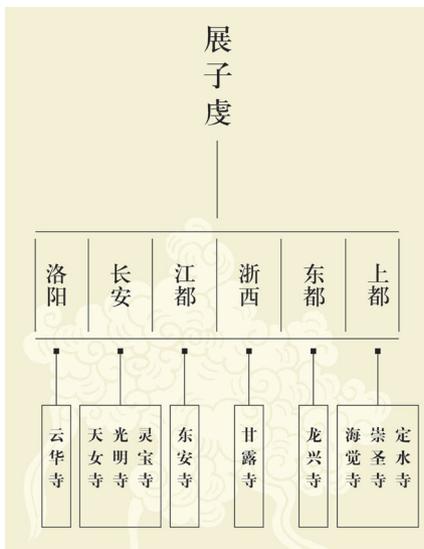
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才能得到提高,也可以多填补点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少一点大而全的简单重复。要重视重点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个案研究。对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应该逐个深入研究。还要开展断代史、地方史、个别领域的研究。研究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有了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进行必要的定量、定性分析和面上的综合概括。这一类研究,比如《申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世界日报》等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是还有不少缺口,还有不少课题有待青年新闻史研究者继续探讨。对于年轻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从个案研究入手也比较容易出成果,比泛泛的面上讨论也更有价值。功夫下到家了,自然会有大量的新成果涌现。

新闻史的研究不怕慢,不要停,一定会把新闻史学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选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社)

## 咫尺千里趣 创为青绿源

### ——浅议《游春图》的美学价值

文 / 叶 子



展子虔创作壁画一览表



北周 萨捶本生故事 (局部)

《游春图》为我国历代著名画家作品中存世最早的一件卷轴画。它在中国绘画史，尤其是山水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标志着我国山水画从初创期到独立成科时的山水新样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一、展子虔其人其艺

提起《游春图》，人们自然就会想起画家展子虔。历史上有关展子虔的文字材料极为少见。不过，据《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图绘宝鉴》《贞观公私画史》及《益阳名画录》等史著分析，大致可以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这对认识展子虔，鉴别《游春图》会有很大帮助。

先谈展子虔本人

展子虔，江南人【一说阳信（今属山东）人，一说渤海（今山东滨州）人】。历经北齐、周、隋三代。大约到了

隋文帝杨坚时，应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北齐初年为550年，隋朝末年为618年，展子虔大约就是这段时期的人。

展子虔所处的时代，虽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的动荡和战乱，但由于隋代统一中原之后，在政策上轻徭役，薄赋税，尚节俭，又实行了均田制度，使生产力得到了较快发展，经济、文化也暂时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尤其是在隋文帝（581—604年）统治的20多年间，人民大多过着安定富足的生活，这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推进作用。隋文帝杨坚喜好字画，建国之初就着手收集书画。灭陈后，得法书、名画800余卷。他广召散布在各地的名画家，并给以适当的官职和俸禄。展子虔就是在北周灭亡后应朝廷所召，从江南来到长安，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画家。

再说展子虔的绘画

展子虔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上，尤其是在山水画艺术发展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成就十分突出。画史上所谓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便是美术史家们所推崇的唐以前最为杰出的4位艺术家。从中可见展子虔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隋朝年代虽短，然绘画成就却显得较为丰富和优异。据史料所载，当时的画种已约可分为道释、人物、动物和山水等画科，而展子虔均有所涉及且成就很高。

道释画

道释画为隋代主要画种之一。这种以佛教、道教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绘画样式，随着佛教的传入，十分盛行，并以壁画为最多。佛教在南北朝时极为发

达，虽在北魏、北周时曾消沉过，然而到了隋代初年，由于隋文帝的大力提倡，佛教文化又兴盛起来。传播佛教文化主要圣地的寺庙中壁画盛行，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隋代画家无不擅作壁画。如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郑法轮、田僧亮、刘乌、孙尚子、杨契丹和尉迟跋质那等著名的画家都曾画过大量壁画。据记载，那时全国的各大寺庙几乎都会有壁画。壁画之盛实过卷轴，可知我国壁画之风，至隋代已达极盛。然画迹最多者，首推展子虔。这一点可以从下表中得出。

从他画过的壁画情况分析，一方面说明当时创作壁画风气之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展子虔所绘壁画的影响之大，水平之高。

展子虔除了画过大量的以道释画为主的壁画之外，还创作了不少以佛教为题材的卷轴画。据《宣和画谱》《贞观公私画史》等记载，他画过《石勒问道图》《法华变相图》《授塔天王图》《维摩像》和《伫立观音》等佛教卷轴画。据《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六法》评述：

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

由上可知，展子虔所作的道释画，显得较为细密精致，并达华贵富丽之境地。

#### 人物画

展子虔除创作了大量以佛教、道教为题材的壁画、卷轴画之外，还画了不少人物画。

据《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等记载，他画的人物画有《弋猎图》《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朱买臣覆水图》《摘瓜图》《故实人物图》《南郊图》



北周 萨捶本生故事(局部)

等。此外，他还画过《梁武帝像》，又为隋代当时的大名人王世充画过像。从中可见展子虔所绘人物画的题材十分广泛。

据载，宋徽宗赵佶曾临摹过展子虔的《高士弹琴图》，并说：“凡人所难写之状，子虔独易之。”为此，他还对展子虔做出过高度的评价：“触物留情，备皆妙绝。”似是将展子虔的人物画艺术推到了极致。

元代的汤屋也曾见过展子虔所绘的《故事人物》《春山人马》《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等图，并在其所著的《画鉴》中对展子虔的人物画做过这样的评述：“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这是说展子虔画人物所用的技法，一是笔法较为工细；二是以色晕染。在表现手法上，具有自己独到之处。汤屋还进一步评价说：“人物面部，神采如生，意图俱足……”可见，展子虔所绘人物，不但注意面部的刻画，而且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已达神韵俱佳之境地。难怪最后汤屋要发出感叹：“可为唐画之祖。”这不但是说展子虔的人物画对唐代的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唐画之祖”，而且其人

物画已达到了开宗立派的地位。

#### 车马画

展子虔不但擅长道释画、人物画，而且专长山水。不过，除此之外，他所绘的车与马，也为人们普遍称道。

据画史载，他画的车马图确实不少，既有专门画马的，也有画人与马的，更有人、车、马同画的。专画马的有《马》《十马图》等；人马同画的有《人马图》《人骑图》《弋猎图》等；人、马、车共画的有《盘车图》《挟弹游骑图》《长安车马人物图卷》等。可惜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展子虔的这些真迹，有的还不敢妄自将其归到哪个画种。

绘画艺术发展到了隋代，创作题材不断扩大，表现手法更加丰富，技法技巧多种多样。画家们虽然在绘画创作上都有自己的手法和特长，但是在具体的题材上也各有所长。如董伯仁擅长楼阁人物，杨契丹喜画朝堂宫阙，郑法士尤擅游宴奢华，田僧亮喜绘郊外柴荆，孙尚之擅长鬼妖神灵等。

董道在《广川画跋》（卷四）“书蔡居安展子虔《马》”一节中有过如下的评价：展子虔作立马而有走势，

其为卧马则有腾骧起跃势，若不可掩覆也。这是说，展子虔所作之马，无论是“立”或是“卧”，均有奔腾跳跃之姿，并具有不可阻挡的气势。可见展子虔画马，是将其画活画神了。此外，董道还将展子虔所绘之马，与“伯乐相马”这一故事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

另《画继》（卷十）《杂说·论近》中，更有徽宗嗜爱展子虔所绘《四载图》等画作一事：

宣和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上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只有三图，其《水行》一图，特补遗耳。一日，中使至洛，忽闻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观。既见，则愕曰：“御阁中正欠此一图。”登时进入。所谓天生神圣物，必有会合时也。

徽宗不但对展子虔的绘画作品赏玩不舍，而且称其为“最为高品”，并誉为“天生神圣物”，像宋徽宗这样的大画家缘何会对展子虔的作品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展的艺术水准之高。由此也不难理解，宋徽宗为什么会在《游春图》上题“展子虔游春图”6个瘦金体大字了。

### 山水画

山水画无疑是展子虔所绘各画科中成就最大的。他所创作的山水画，不仅在中国山水画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是奠定了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崇高地位。虽然画史文献上所记载展子虔的山水画并不多见，除了《游春图》《春游图》《水行图》之外，还有《南郊图》一卷。不过，尽管画史记载其创作的山水画不多，然对其山水画的评价却极高。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隋》载：

僧云：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

台阁、人物、山川，咫尺千里。

又据《宣和画谱》（卷一）《道释一》载：

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僧谓：“子虔触物留情，备皆妙绝。”是能作难写之状，略与诗人同者也。

由此不难看出，展子虔所绘山水，

不但具有远近空间之感，更具“咫尺千里之趣”，而且具有诗情画意之情蕴，实为开文人画之先驱。

中国远古绘画，多以人物为主，而对于山水，并没有作专题绘写的。那时所谓的山水，只不过是作为人物的陪衬、背景及辅助性的形象而已。到了魏晋南北朝，山水画逐渐增多，但在技法上，



尚处于稚嫩阶段。所绘之山，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所画之水，则“水不容泛”；所绘人物，或“人大于山”；所作之树石，则成“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极不协调。这些我们现在虽无法见到流传实物，但从隋代之前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却可看出。

我国早期的山水，只不过是作为人

物的陪衬、背景及辅助性的形象而已。然而到了隋代，山水画的创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山水画不再仅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已开始独立成科，并成“模山拟水，得其真体”的山水新样式。这一切正是展子虔的功劳，也是展子虔的伟大之处。此后，“展子虔画山水法，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遂终成“唐画

之祖”（《画鉴》）。

## 二、《游春图》的笔墨特性和时代风格

展读《游春图》，人们并不仅仅留恋于那湖光山色、春光无限的大好河山，而更为作者运用独特的笔墨手法展现的个性风格所倾倒。为此，我们可以从笔墨技法了解到展子虔及隋代山水画

隋 展子虔 游春图 绢本 设色 43cm×80.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局部说明: 人物与山峦树石技法



局部说明: 树叶技法

所表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并从中体会到《游春图》特有的美学价值。

#### 笔墨技法

《游春图》中的山峦树石皆用细笔勾勒轮廓，而不加皴斫，线条无甚大的粗细提按变化，然却显得朴拙劲朗；所绘人物全以细劲的线条勾描，纤如毫发，人物形态虽无太大的变化，然却神采奕奕；其画山水，更是一丝不苟，画面显得柔美流畅；而所绘树叶，纵有勾笔、散点画法，却类似“个”“介”字点法，似不成形，然显得朴拙古拙。那山顶坡脚的点苔，劲健爽朗，显得浑朴谨拙；树虽绘有多种，树干形态却千篇一律，无甚穿插多姿的变化，似游离于山石坡顶似的，然由于运笔较为成熟，笔法墨法有轻重变化，虽未用皴法，却仍能看出山石树木的质感。这种画山石不作皴斫，画松干不用松鳞，画松枝不作细针，即山不似山，树不似树的笔法特征，正好展现出山水画从雏形阶段发展到初创时期的风格特征。这正是汉魏两晋南北朝后山水画的表现方式。这种画法既改变了远古山水“若伸臂布指”的那种稚拙的

山水图式，也体现出隋时这种“盖创为山水之初，法之未备然耳”（詹景凤语）的山水样式。

《游春图》中所绘的山峦树石，皆用细笔勾勒。图中人物全以细致的线条勾描。形态虽无太大的变化，却显得神采奕奕。勾勒轮廓，虽不加皴斫，却显得朴拙劲朗。山顶坡脚的点苔，劲健爽朗，显得浑朴谨拙。树叶的画法，采用勾笔、散点画法，类似“个”“介”字点法，显得朴拙古拙。

#### 设色敷彩

《游春图》的山石树木虽然空勾无皴，然全以色渲染。全图山水以青绿设色为主。山顶以青绿敷之，山脚则用泥金；树叶设色，或以色染，或以色填，或点以白粉桃红，松树不写松针，直以深绿点之。全图在青绿设色的统一格调下，显得潋滟而生拙，丰富而单纯，富丽而古艳，充分展示出我国早期山水设色那种“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样式，标志着山水画的创作，已从原先设色古艳而富有装饰意味的图式，向较为完整的山水画创作过渡，自此始开青绿山水之源。

#### 构图布局

《游春图》的章法布置也极有特色。右上部分绘有崇山峻岭，山峦起伏，数峰叠起；右下部分绘有土坡，低坡丛树，山路透迤，既为崇山峻岭的下段延伸，又作为铺垫，使全图具有稳重感。左下部分绘一低峦小山，与右上边山脉遥相呼应，形成对比；中间绘有大片水域，波光潋滟，湖天一色。一小船点缀其间，船内绘有三四人物，姿态不同，形态各异，更使全图倍增神秘感。全图比例恰当，层次分明。这种以山水为主体，人物为点景，恰当配以殿阁舟桥，并开始注意客观物象之间的远近、高低、大小的一般关系，以及深度、层次、比例等透视关系的变化处理，使山水画创作变得较为合乎现实生活的新格局，这正是隋朝山水画的特有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无论笔墨技法，还是设色敷彩，抑或构图布局，《游春图》所展现出来的时代风格，正是六朝以来山水画从雏形阶段向初创阶段转换时期的山水风貌。它不但比魏晋时期山水画“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以

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的那种仅作人物背景的山水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而且也比此后的顾恺之、王微、戴逵、宗炳等人的“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迫目以丈，迥以数里”的山水画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此改变了山水画依附于人物画而成“模山拟水，得其真体”的山水新样式，从而成为我国山水画从雏形期到初创期，进而演变成山水画独立成科的代表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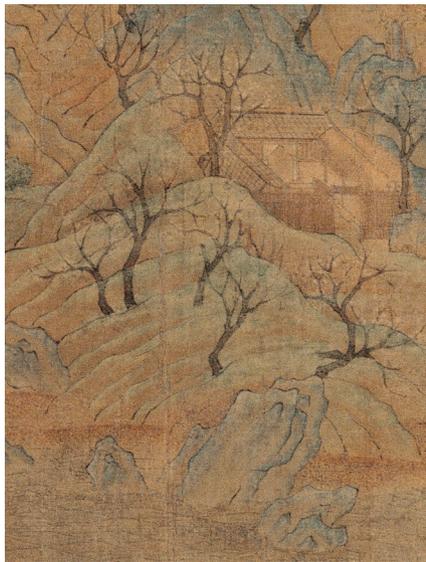
### 三、《游春图》的艺术价值

若要全面论析《游春图》的艺术价值，首先得了解我国山水画的发展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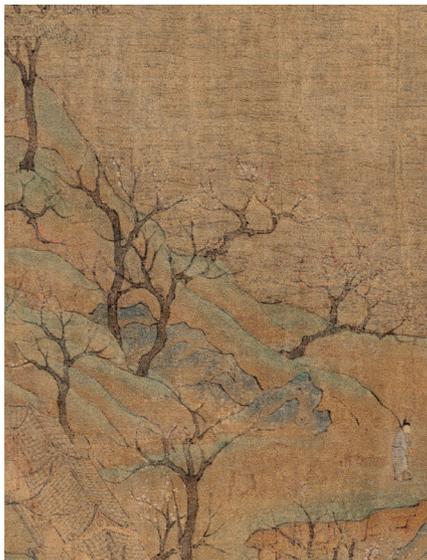
从中国卷轴画艺术的发展历史看，最早出现的是人物画，再是山水画，以后才是花鸟画等科目。确切地说，山水画的萌芽期始于晋代，而晋代的人物画却已十分成熟。虽然此时的题材已大为拓展，但获得突出发展的仍然是人物画。而山水画在当时只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的。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庄思想的流行，以及山水诗、山水文学的大量出现，尤其是玄学的发展，山水画才从单作人物画的背景中逐步脱离出来。时代发展到隋代，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皇家的喜爱，以及宫苑题材创作的兴起，这种以山水为独立画科的优秀山水作品才得以正式出现。而这一点，从隋代展子虔创作的《游春图》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也就是说，只有到了隋代，才有可能出现像展子虔《游春图》这样的山水样式，而展子虔的《游春图》正好印证了隋代山水画这种特有的风格。因为在我们看不到其他隋制时的山水画样式，或从流传下来的别的山水画中看到不合隋朝山水样式时，展子虔的《游春图》才显示出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难能可



山顶施以青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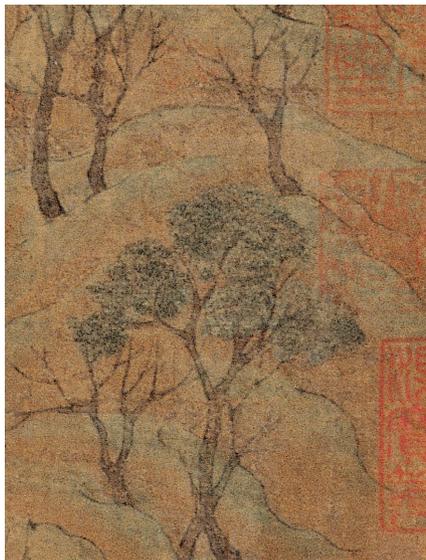


山脚施以泥金



树叶点以白粉桃红

《游春图》多种设色敷彩法



松枝以深绿点之

贵的价值所在。

山水画虽然产生于晋宋，到了隋代初期并无较大的发展。然在此期间，也就是到了展子虔之前，还是有一些山水画家在某些方面已画得相当不错，只是相比之下，没有展子虔来得全面罢了。

历史发展到隋代，山水画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并充分展示出中国山水画从雏形期发展到初创期的风格特征，终于独立成科，成为中国绘画中的一个

主要画种。这一方面是由于隋代统治阶级及社会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山水诗的兴起及玄学的影响。不过，这一历史责任却被展子虔担当了起来，这一切，便是由展子虔创作的《游春图》所展示出来的。《游春图》描绘的是一个风和日丽、春色宜人的季节，贵人仕女去都城郊外游春踏青的情景。全图的右上部绘有大片的山石丛林，一条湖堤曲径蜿蜒地伸入山洞；山下桃李盛开，山上碧草成行。游春的贵人仕女或策马驰



局部说明: 右下部绘有土坡, 低坡丛树, 山路逶迤, 既为崇山峻岭的延伸, 又使全图具有稳重感。



局部说明: 中间绘有大片水域, 波光潋滟, 湖天一色。一小船点缀其间, 船内绘有三四人物, 姿态不同、形态各异, 使全图倍增神秘感。

骋, 或漫步踏青, 或伫立而倚, 神情欢悦, 神采各异。画面的左下角绘有山林茅屋, 湖畔绿茵成行, 春水涟漪。画面中央, 山色一片, 江流天际, 粼粼水波, 碧映荡漾。全图构成一幅春意盎然、江山多娇、山水一色的游春图卷。

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没有《游春图》这一珍贵的国宝流传至今, 怕也就不能真正证明山水画这一特殊时期的时代风格和艺术风貌。正是因为《游春图》的流传, 才使人们有幸见到隋代山水画的真实面貌, 以资引证画史所记录的这些史料之真实。

那么, 具体地分析, 《游春图》又具有哪些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真正的历史

价值呢?

第一, 绘画方法上, 它彻底改变了隋以前的山水样式, 展现出一种新的山水空间格局。隋代之前, 传统绘画中的山水, 仅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陪衬而已。画家们都把人物屋宇画得很大, 把山水树石仅作点缀。人物与山水之间没有客观自然的比例, 而《游春图》却改变了这些旧式山水的画法。画幅中, 山的画法, 左边山坡略小, 右边一个山坡占据了半个画面。当中是水, 往纵向延伸。山有大小之别, 坡有层叠之势, 且层次分明, 有纵横深远之感。树的画法, 虽较稚拙, 却有较大的变化。水波的画法, 线条凝练, 跌宕起伏, 具有空

旷而灵动之感。这些具体的方法, 无疑是改变了以往山水自然空间的难度, 从此开创了新的山水样式。

第二, 绘画历史上, 提升了山水画的历史地位, 开启了山水画独立成科的里程碑。中国绘画, 最早出现的是人物画, 包括道释画。隋代以前, 山水画既未独立成科, 更未作为一种新的画科独立出现。《游春图》一反先前山水画的形态, 将山水作为主体, 人物作为点景, 再配以殿阁舟楫, 并成功地处理好客观物体之间的大小、远近、高低的比例及空间的显示, 使山水画从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

第三, 绘画创作上, 对后世山水画的创作, 尤其是对唐初及李思训的青绿山水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游春图》的创作, 无论是技法技巧的运用, 还是空间透视的处理, 抑或题材的刻画, 都是一种新的突破, 对以后山水画的发展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此, 较为稚拙的旧的山水画体态已经结束, 新的山水画创作形态逐渐形成。

史实证明, 展子虔不但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画家, 而且他所创作的《游春图》, 上继六朝传统, 下启唐代画风, 在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性的历史意义。从此, 展子虔和他创作的《游春图》这一山水画风为唐代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宗, 对唐以后乃至整个山水画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怪乎《游春图》会被历代史评家誉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标志性作品。

(作者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 展子虔《游春图》的一点浅见

文 / 张伯驹

关于鉴定祖国文物，我一贯不敢执笔为文，盖出发于爱护祖国文物立场，除公认伪迹者外，对传世文物，素持有谨慎将事之态度。当然应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多所启发，但因各人之性情不同，又囿于才识之疏，只好多学少说。顷读《文物》1978年第11期傅熹年同志《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一文，广列佐证，洋洋大观。然我仍有不同意见不能已于言者，惜以年老体衰，未能罗列文献资料，只可简略言之。

一、幞头：在一时代之中，冠中有多种样式，视其人之身份而异，例如后汉郭林宗折角巾，人多效之，此当为文人巾之一种，当然还有其他样式之巾。墓俑多为武士仆隶，即为官吏，属大型塑像，亦等于人物画，冠服衣带俱备。

《游春图》之人物，则属于山水画之人物，只是点写，著录中亦云人马如豆，不能专画冠服，以幞头断为非隋画，我还存疑（壁画有墙壁、绢素，与工匠画、文人画之不同，姑不具论）。

二、建筑：在一时代之中，江河流域，东西南北，各有不同形式之建筑，城市与农乡与山林，亦有不同。余河南旧居楼一栋，居已四世。余曾到山西，尚存有明代及清初不少的建筑，与余旧居楼之形式完全不同。《游春图》之地区，是在江南，还是在中原，疑莫能决，且又非山水界画，以描绘完整壁画之建筑，来作仅盈寸之建筑比拟，以为

画非隋画之佐证，仍可存疑。

三、《江帆楼阁图》与《游春图》同出于晚唐底本而传摹复制的，这个底本的原本是否为隋画，按传摹复制应当传真逼似，何必要掺入后代画法形象？又晋至六朝作画时，当横几席地，所画必系卷子，晚唐已有坐具，所画方有直幅（又证明《江帆楼阁图》是四扇屏风的最末一幅，在晚唐是否有四扇屏风，亦是疑问。余曾见黄庭坚四扇屏风草书、岳飞对联，此伪品不待考证）。《游春图》简单质朴，是画之发展尚未成就时期，《江帆楼阁图》华丽繁复，是画之发展已将成就时期，只能说展子虔向李思训发展，不能说李思训向展子虔发展，先后倒置，以《江帆楼阁图》来作《游春图》非隋画之佐证，似亦可商。

四、历代宫廷所收古代之画，当然有伪迹，如清乾隆时曾经过鉴定，《石渠宝笈》有“上上”“上”“中”等级。溥仪携走之书画，在未出宫前，亦经袁励准等人鉴定，真精者钤“宣统精鉴”玺。宋赵佶宣和书谱、画谱中之品，是经过赵佶及其侍从之臣的鉴定，其情况今日不得而知。

五、在画前赵佶题“展子虔游春图”6字，不著朝代。从《大观录》记载看，唐五代以前之画，如阎立本《职贡图》、王维《雪霁捕鱼图》、王齐翰《勘书图》，赵佶题签皆不著朝代，是否皆为传摹复制之画，对照研究，始能

得出论断。

六、我们鉴定年代较远的古书画，只有依凭前人，因为他们年代近，见者多，例如周密比文嘉等人要早300年左右，其意见比文嘉、詹景凤等更有分量，更值得我们认真考虑。而赵佶比周密又要早200年左右，他的分量也值得我们认真考虑，而且他又是画家。

七、我们鉴定明、清画的真伪，比较有把握。由初明永乐至今，约570多年，由赵佶至初唐贞观，约500年，是否赵佶鉴定隋唐画的真伪就毫无把握？如画为北宋中期所摹，距赵佶不过六七十年，等于我们鉴定清同、光时之画，更易辨识。如为宣和画院所摹，即在当时，金章宗题赵佶画《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天水摹张萱捣练图》宣和画院摹本，是否应有臣某敬摹进呈款，这里赵佶不书摹字，而径书展子虔《游春图》，亦难解释。

以上余简略之言，不敢断定图非隋画，或必为隋画，只对傅同志之文，表示存疑而已。但是我以多年来过爱文物，除公认为伪迹者外，对传世文物之鉴别，素以慎重为旨，尚希傅同志谅之。以吾国历史之久，文化之先，而隋以前之画，竟无一件传世，亦良可慨叹。

（节选自《文物》1979年第4期）

## 《游春图》年代的探讨

文 / 杨仁恺

现藏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是数百年来颇负盛名的一幅古代绘画作品。画幅至今大体保留了北宋宣和装钤印形式并宋徽宗赵佶题“展子虔游春图”6字签。近千年来，这幅名迹历经北宋内府、南宋贾似道、元仁宗、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清安歧、清内府、现代张伯驹等人递藏，又屡见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文嘉《严氏书画记》、詹景凤《东图玄览》、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升《大观录》、安歧《墨缘汇观》和《石渠宝笈续编》等历代重要书画著录，可以称得上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名画。由于原画无款，千百年来一直沿袭宋徽宗的签题，作为隋代绘画中相当重要的代表性作品，为艺术界所重视。

1978年11月，傅熹年先生在《文物》月刊上发表《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一文，否定了《游春图》的时代与作者，是800年来对这一作品提出的不同看法的第一人。

傅文首先提出，元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两次提到《游春图》，其中有一则为：“展子虔《游春图》，今归曹和尚，或以为不真。”傅文据此认为周密对这件作品是持怀疑态度的。进而傅先生认为，《游春图》作为山水画在隋代绘画资料中很难找到可资比较的对象。“如果从画中所表现的服饰和建筑物的特点来分析，则比较容易达到目的”因此选取了服饰钗头和建筑物上的斗拱、鸱尾的形制来验证是否符合隋代特点。经傅先生仔细辨认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一) 就巾幘形制而论，《游春

图》的时代上限恐难超过晚唐。

(二) 就斗拱特点来说，《游春图》的时代不能早于晚唐，与隋制相差甚远。

(三) 《游春图》中的鸱尾与北魏至唐中期的鸱尾特点不合，和《瑞鹤图》中的鸱尾很近似，也与《宋会要辑稿》和《营造法式》中所载情况一致，具有典型的北宋鸱尾特点。就此而论，《游春图》的上限恐难超过北宋。

基于上述三点，得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游春图》的具体绘制年代恐难早于北宋中期”的结论。

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之上，傅文又探讨了宋徽宗的鉴赏眼光、宋画院以摹本代替难以修复的传世名作以及徽宗题署与《游春图》真伪关系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傅先生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旧题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轴的构图景致描绘与展子虔《游春图》卷后四分之一构图景致描绘相比较，从而认定《江帆楼阁图》乃是四屏之最末一幅，《江帆楼阁图》与《游春图》均为一绘画祖本的摹本，因此得出最终结论：“根据《游春图》的底本在唐时即已存在的事实，根据画中出现到晚唐至北宋的服饰和建筑特点，考虑到唐宋时代大规模传摹复制古画的情况和北宋时人对复制品的习惯看法，我认为《游春图》是北宋的复制品，也可能就是徽宗画院的复制品，因为其底本历来相传它与展子虔及其画风有关，赵佶就沿用传说旧名，题作《展子虔游春图》。它在山水树石画法上，较多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但服饰和建筑上不够谨严。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部分尺

寸太小，底本稍有损坏即模糊难辨，复制时做了补充和加工，稍稍出以己意，因而掺入晚唐至北宋的特点。至于周密所说的‘或以为不真’，可能即指这些细部不合古制，怀疑它是个伪本，也可能是按元代真伪划分的习惯范围，指它是摹本而非原作而言。”

傅先生文章发表后，马上就有了《游春图》的原收藏者张伯驹先生拟文反驳。张先生《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以7条理由维护原来观点，反驳了傅的观点。大体为幘头、服饰、建筑结构等制度一个时代就并存多种形制，因时风和地域都会有较大的区别，用今天所了解的部分知识为根据进行讨论，实为不妥；如果说《江帆楼阁图》与《游春图》同出于晚唐底本的摹本，为何《江帆楼阁图》较《游春图》华丽繁复成熟许多，这只能说明《游春图》向《江帆楼阁图》发展，而不能说明逆向发展。故以《江帆楼阁图》作为《游春图》非隋画之佐证，于理不合。徽宗题署摹本的情况也不普遍，北宋所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也未见徽宗题，傅说尚需讨论。

关于《游春图》创作年代的认识，目前傅、张观点相互对立，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另外据台湾学者詹前裕曾发表一篇《再谈展子虔〈游春图〉的真伪与时代问题》，由于一直无缘拜阅，不知所持观点如何，存此待补。

明人詹东阁《玄览编》对此作也做过较为切实的考察，列举各点以肯定为展氏之作，可资参考。

(转载自《中国书画鉴定学稿》)